《一个人的三条河》阎连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29.80元

该书是一部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沉重之书，字里行间浸透着普通中国人的苦辣酸甜。作者以自己出生的村落为基点，描写了从家族至亲到儿时伙伴等几十种或悲或喜的人生。这块如同当下中国缩影的小小的中原之地，从不出产成功和胜利，只诉说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存在与消逝，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艰苦劳作、长久病痛、短暂欢愉和生离死别。

适合馆藏：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馆配新书

《笑浮生》安宁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28.00元

该本区别于正史的关于古代人吃喝拉撒、恋爱结婚生子及其性爱的琐碎生活的书。其立足于《笑林广记》的文本，摘取其中与男女情感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幽默笑话，同时对比当下人鸡飞狗跳的现实功利人生，解读正史中被“封建社会”一词，遮蔽了的真实且让人诧异的“自由、女权、幸福”的情感生活。这些笑话，类似于当下的“微博体”，短小，幽默，讽刺，八卦，却可以窥到原汁原味的古代夫妻生活，及不乏人性弱点的小市民喜乐人生片段。

适合馆藏：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

（上接第9版）

国内部分图书馆古籍保藏现状独家调查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里的部分古籍

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演示古籍修复过程

部分图书馆古籍保藏特色综述

国家图书馆
采取“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模式

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馆藏古籍和特藏主要是通过国家调拨、本馆主动采访和藏家捐赠（包括无偿捐赠、有偿捐赠）等渠道获得，其质量之高、数量之富，世人有目共睹。国图一向鼓励私人收藏家将收藏以捐赠（包括无偿捐赠、有偿捐赠）及出售的方式转与国家图书馆，一则国图等公藏单位有更好的保存环境和专业修复、维护的条件，利于古籍长期保存；二则在公藏单位能够发挥文献服务学界，方便读者利用的作用，能让古籍更好地传承。而对于捐赠的名人手稿日记会尊重捐赠者及著作权人的意见，是否提供流通。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国图加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牌子并承担古籍普查、培训、保护研究等职能；随之成立的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下设的办事机构，承担对全国的古籍普查保护进行规划、组织协调等工作。

国图在管理古籍方面遵循国家古籍保护政策，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原则，在传承的基础上，方便学术研究和文化推广。因此，国家图书馆每年都投入一定经费进行古籍采访征集、古籍保护试验研究、古籍缩微、数字化及出版等。

具体而言，在古籍保护上采取“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的基本模式，“原生性保护”是对古籍特藏原件进行修复保护，改善收藏环境等方式保护古籍。古籍修复遵循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尽量保存古籍原始状态，对必须修复的善本特藏，一般是由20位修复专业人员、8位文献保护专业人员以及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制定修复方案，并操作实施。整旧如旧，最少干预也是国际上古籍修复行业共同遵循的原则。由于古籍在馆藏中的特殊价值和地位，因此，古籍收藏管理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库房安装各种安防技防设施，人员管理也极其严格。国图规定的善本古籍的恰当典藏保护条件是恒温恒湿、防虫防霉等 ，而且善本特藏借阅一般不提供原件，以保护文物。“再生性保护”则是利用缩微技术、数字技术、复制影印技术，生产出替代品，广其流传的同时以减少原件的使用，实现对古籍的保护。

国家图书馆在珍贵文献数字化方面的力度也非常大，甲骨、金石拓片、西夏文献、数字方志、老照片、年画等，已于网上对全世界的使用者免费开放多年。展览也是向大众普及古籍知识，分享传统文化的途径，每年国图都会有多期古籍类的展览，成为传统文化爱好者的精神盛宴，也起到普及古籍保护知识的作用。古籍数字化由于数字化对象的珍贵程度较高，所以对设备和技术、专业水平要求更高，因此需要国家更大的投入。

北京大学图书馆
秉承“资源利用与古籍保护”的原则

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馆”）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其馆藏古籍总量约15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2万余种、20余万册，居全国高校之首，在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中也位居第三。各类特藏如敦煌卷子、地方志、家谱、舆图等，均收罗宏富。另有金石拓片4万余种、8万余件，亦居国内收藏机构前列。2008年以来，馆藏352部古籍善本分别入选前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北大图书馆也被列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北大馆宏富的馆藏是经几代人对古籍保护收藏的努力累积而成的。（1）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建立，1902年正式设立了藏书楼，馆藏首批善本书来自巴陵方氏碧琳琅馆的原藏，其中多有购自日本佐伯文库的珍本。当时也得到清政府的支持，调集各省官书局所印书籍入藏，并每年拨款万余两白银作为购书经费，其中一半用于购买古籍，使得藏书量持续增长，约计7.8万册，奠定了北大古籍收藏的雄厚基础。（2）民国年间，通过接收名家藏书，北大馆古籍收藏有很大的发展。如1937年购入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928种、5368册，主要是戏曲小说；1939年接收李盛铎“木犀轩”大部分藏书9087种、58385册，有诸多宋元刻本、手稿本、精钞本及明清善本。此二项专藏大大提高了北大馆藏古籍的质量和价值。（3）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图书馆20余万册古籍并入北大馆，大大扩充了北大的古籍收藏。（4）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先生出任馆长期间，亲自搜集的200余卷敦煌卷子，至今仍是北大善本书中的瑰宝。

北大馆的金石拓片收藏也极具特色，在历史的累积中有多种来源，主要包括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二家藏品和原北大文科研究所全部旧藏等。近年来也一直在有计划地收集拓片，不断补充新史料，规模持续扩大。

北大馆近年来古籍购买量在减少，但也在努力把握机会购入有特殊价值的古籍。如2005年通过学校支持购买了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艺术大师程砚秋先生家藏“玉霜簃”千余册戏曲抄本，为海内外所瞩目。2002年开始，北大馆持续购买家谱，至今已有家谱2200余种，属国内收藏大馆。

目前北大馆藏古籍集中于地下两层13个书库，其中善本书库5个，普通古籍书库4个，拓片库1个，未编目古籍书库2个，胶卷和光盘典藏库1个，共约4000平米。绝大多数的古籍都放置在樟木书柜中，还有少数存放在密集书柜。书库库内温度可控制在14～18℃之间，但湿度控制还未达到古籍保护的基本要求。其中只有一个书库安装了除湿机，可将湿度控制在规定的50%～65%之内，而其它12个书库因排水问题无法解决而不能安装除湿机。此外，书库灭火系统在建设初期配置的是水喷淋灭火装置和气体灭火装置。但现在来看，水本身就是书籍最大的敌人，水喷淋装置显然存在一定的隐患，而原配置的气体灭火器系统历经数年，现已成为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淘汰产品，至今还未及更新。另一方面，尽管书库条件相对陋简，但典藏管理严密有序。北大馆在日常古籍服务中，主要分阅览服务组与书库典藏组。两组互相配合，遵循各方面典藏制度，保障古籍调阅的安全。

北大馆秉承“资源利用与古籍保护”的原则，开展了古籍保护工程中多个面向的工作。（1）馆藏古文献数字化整理。从1970年代末开始，北大馆有计划地对古籍善本进行拍摄，制成缩微胶卷约近3200种、300多万排，其中主要包含宋元版本及部分明版书。拓片则是从2002年开始进行数字化扫描，至今已完成近2万种。并将扫描后的图片上网于馆藏古文献检索系统“秘籍琳琅”，供阅览室读者查阅，同时也制成光盘作备份存档。馆藏古代珍贵舆图2000余种，现已扫描整理清代舆图3798幅，清代阵图432幅。这些高精度的图片汇成图像数据库，提供给读者直接查看，并提供文献复制服务。

（2）馆藏古文献影印出版。将古文献影印出版可以使馆藏稀见善本典籍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分离，之后原本典籍可视作文物永久珍藏，影印书则可作为普通馆藏文献开架供读者阅读。北大馆多年来一直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部分馆藏善本古籍影印出版。

目前，北大“古籍新馆”的规划工作正在进行，在物质条件上，新古籍馆将会实现理想的空间环境与良好的设施条件，书库面积、书柜设置、温湿度控制、灭火设备等各方面，都将按照古籍保护的理想标准来全面建设。而古籍保护与修复的发展同样需要无形资产投入，即学术研究的深入、技术能力的提升、人才的培养等诸多软实力因素，北大一直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其古籍保护与修复事业因此才能获得更丰富、更广阔的发展。

南京图书馆
有步骤地对馆藏古籍进行修复和保护

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古籍收藏源流绵长。南图的前身是1907年成立的江南图书馆和1933年成立国立中央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后改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1952年正式并入国立南京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在1950年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1954年改名为南京图书馆，成为江苏省省级公共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古籍主要是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浙江钱塘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八千卷楼”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丁氏藏书在文化史上的价值，超过其余三大家。1907年江南图书馆以7万元巨款，全部购回“八千卷楼”藏书60万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存留的一部分古籍和解放后接收的相关古籍也是南京图书馆古籍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图历史文献部的主要收藏是1949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年）以前印制、书写而成的各类文献资料。共有历史文献图书、报刊230万册，其中古籍160多万册，含善本1.2万部、14万册。目前已有363部古籍分别入选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三次分别入选73部、209部、81部。在前不久公示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南图再次入选96部。

南图馆藏古籍特色藏品有辽写经、敦煌遗书、宋元刻本、方志。目前馆藏古籍中年代最久的有敦煌遗书，存有4卷轴，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另有宋元刻本200部左右，明刻本近7千部。

南图古籍书库独立成区，其中善本库面积即达1300平方米。（1）书库墙体由钢筋混凝土整铸而成，具有优良的密闭性和保温隔热功能性，防盗防震功能良好。（2）南图古籍书库采用先进智能型密集式书架，每组密集书架由六节书架组成，由电脑控制书架的开关，每组书架所藏古籍也可在书架液晶显示屏中查询，书架开启可根据需要采用三种不同方式。智能型密集书架的使用，既提高了古籍的装架率，又达到了有效的阻燃、耐腐蚀作用。而采用樟木原板作为隔层板，既可以防虫防霉，更可以避免古籍接触油漆及金属后造成损害。（3）南图古籍书库在消防方面，安装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二氧化碳（气体）自动灭火系统，确保安全。（4）安防方面，古籍书库被列为馆一级安保区域，设有24小时监控报警系统。书库每道库门设有2道机械锁、1道电子锁，需要2位工作人员同时打开，形成安全“双保险”。（5）空气净化与通风情况良好。为确保书库温湿度能够控制在标准要求的范围内，书库配备了2套从加拿大进口的独立恒温恒湿精密空调机组，以保障“一对一”24小时连续不间断工作。空调机组设备与书库完全隔开，库房长年温度可保持在16至20度，湿度保持在45%~60%之间。

长期以来，南图一直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馆藏古籍进行有针对性的修复和保护，古籍修复工作始终有序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馆设有专门的文献修复室，面积达350平方米，配有多种修复专用设备，目前从事修复岗位的工作人员有7名。2009年，南图成功入选全国首批12家国家级修复中心之一。目前，南图已全文数字化的古籍达1648部8165册805929页。

湖南图书馆
古籍阅览、保管、开发职能分明，三分而立

湖南图书馆（以下简称“湖南馆”）始建于1904年，是我国第一家以“图书馆”命名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湖南馆主要通过以下4种途径获得馆藏古籍。一是官方征集和调拨。1950年成立的包括湖南馆参加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社会流散文物、文献的收集工作，将全省大部分古籍划归湖南馆集中管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馆自造纸厂化浆池边、街头焚书堆中，抢救出大量的文献。二是私人捐赠。湖南诸多私人藏书家，如长沙叶氏拾经楼、长沙龙氏媚夜楼等，深明大义、化私为公、纷纷将所藏捐献湖南馆。三是自行购买。申请专项购书经费，自行购买部分流散民间的古籍。四是交换，用古籍副本与其他古籍收藏单位进行互通有无。湖南馆也划拨专门的经费从事民间古籍征集工作，每年征集古籍（包括家谱）数千册。并鼓励私家捐赠，给予一定的奖励，颁发荣誉证书。

湖南馆的古籍管理工作已趋系统化，古籍阅览、保管、开发职能分明，三分而立，并成立了相关部门——历史文献部、典藏保管部、文献研究所，各司其职，分别承担读者阅览服务，书库管理、古籍修复和古籍数字化，古籍的开发利用等相关职能。针对古籍，实行的是分级保护，分别设立善本书库和普通书库，根据古籍的珍贵程度实行不同的保护措施。

湖南馆在古籍保藏和管理上采取了多项举措。（1）完善书库的防火防盗防虫措施，配备相关设备，如恒温恒湿空调系统、烟感、温感区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七氟丙烷自动灭火系统、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域区110联网报警系统等；（2）制定相关工作制度，明确职责范围，如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复制制度、湖南图书馆书库管理制度、湖南图书馆古旧文献保护性阅览制度等；（3）厘清家底，一一登载在册，配备专门的管库人员，实行严格的出入库制度；（4）实行阅览服务与书库管理分离的政策，内外有别，相互监督，加强古籍的安全性监管。

而在特色馆藏方面，湖南馆一方面秉持自行研究，已出版《湖南氏族源流》、《清风画韵—馆藏扇面选集》等多部专题著作。另一方面，提供底本，或影印出版，或整理出版。如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曾国藩全集》，湖南馆提供了绝大部分曾国藩原始手稿。2006年启动的《湖湘文库》是一项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导，并组织实施的重大出版工程，是一套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献为目的的大型丛书，拟出版1000种湖湘人物或湖湘文化著作。其底本大部分则由湖南馆提供。又如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推荐提供《两崖集》、《石比部集》等百余种底本。

湖南馆所藏古籍目录早已上网，可以查询。并且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立了专门的缩微中心，每年完成大量的古籍、报刊、家谱的缩微化、胶卷化工作。近年来湖南馆又成立了专门的字画拍摄小组，馆藏的7000余幅字画将全部制作电子档案，永久保存。

辽宁图书馆
注重加强古籍整理与开发

辽宁图书馆（以下简称“辽宁馆”），收藏有56万册的古籍文献，其中善本古籍12万多册，普通古籍34万册，未整理古籍近10万册。

辽宁馆馆藏古籍总量和质量虽然不能与国家馆、历史较久的少数省市馆及重点大学图书馆比，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全国图书馆中还是可以称道的。2008年到2012年，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辽宁馆有296部古籍精品榜上有名；2008年辽宁馆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首批全国57家）；2010年，辽宁馆古籍修复中心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成为全国首批跻身此行列的十二家单位之一。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辽宁馆收藏的古籍文献质量较高，有相当部分是存世孤本、珍本，为业界所瞩目。一是宋元版古籍精品较多。辽宁省图书馆藏的宋元版古籍大部分出自原北京清宫，很多是古籍精品、海内孤本。如宋版《抱朴子内篇》，是现存《抱朴子内篇》的唯一宋刻本。这些藏品在古籍业界均享有盛誉。二是闵版书收藏集国内大成。辽宁省图书馆藏的明代浙江吴兴闵齐伋、凌濛初两大富族辑评校订，并采用套版印刷技术，用纸质精良的白绵纸套印的书籍，后人称为闵版书，也称闵凌刻。目前馆藏闵版书已达119种，为国内收藏闵版书之最。三是殿版书特色突出。现藏殿版书600多种，1000多部。这些殿版书大部分来源于沈阳故宫，小部分从其他渠道收购。内容涉及经史子集诸多部类。文字多用汉文，兼有满文蒙文。殿版书版式开阔，刻工整洁，印刷精良，尤其是乾隆以前，刻书用纸细薄，洁白晶莹，雕刊印工更是优美绚丽，在历代刻本中别具一格。四是罗氏（罗振玉）藏书完整丰富。辽宁省图书馆藏有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先生所藏善本16010册 及家刊本约4万余册。五是稿本、抄本藏品精良。如辽宁馆馆藏的稿本《聊斋志异》是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小说集，有着特殊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辽宁馆收藏有众多质量较高的朝鲜、日本版本古籍。

辽宁馆的“特藏部”，也是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所在地。现有工作人员23人，其中研究馆员5人、副研究馆员3人，其他为馆员或助理馆员。辽宁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一直以来得到了国家和省政府的财政支持。90年代初，文化部分年度先后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古籍保护，古籍善本基本上都制作了樟木匣和函套，起到了防虫、防尘、防光的保护作用。2000年省财政先后投入资金500万元，建成地下善本书库，配置了国内一流的消防报警灭火系统、防盗报警系统、中央空调吸湿机以及密集书架等，古籍基础设施条件得以改善。

当然，在古籍保藏、管理上，辽宁馆也面临困难，一是人才缺乏，还需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适应古籍保护工作开展的需要；而是资金缺乏，目前辽宁馆正准备搬迁新馆，搬迁后古籍保护条件会有很大的改善，但这需要资金的支持与投入。

浙江图书馆
自主开发和为社会开发提供底本相结合

浙江图书馆（以下简称“浙江馆”）的古籍主要是靠采购、调拨、捐赠等途径得以入馆收藏，例如，《文澜阁〈四库全书〉》是1911年浙江省政府调拨的；1951年底，刘承幹捐赠了嘉业藏书楼及其藏书。在吸纳和接受私家古籍方面主要是采取购买和奖励并重的原则。

浙江馆近几年在古籍保藏、管理方面的改造项目主要是善本特藏库房及其阅览室的恒温恒湿净化系统的改造、古籍库房建筑的防雷工程、排水工程、监控系统工程、古籍修复中心改造等，专项改造经费约在600多万元。

浙江馆对馆藏古籍采取分级管理的办法，也就是善本保护条件好一些，库房阅览室完全达到国际标准，保证保存与使用环境的恒温恒湿与净化，并且库房24小时运行。其它古籍保存条件弱一些，体现了主要先保重点，绝大部分古籍的装具是樟木的。

浙江馆虽然已在古籍保藏上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支持，但与古籍的保护要求相比，经费还是不够，如果全部库房达到国际标准，按要求使用，运行费将会相当高。所以经费问题成为图书馆在古籍管理方面面临的难题。

浙江馆在保护古籍的前提下，一直以来都是有计划地开发馆藏古籍，一方面是自主开发，如《浙江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浙江家谱总目提要》等；另一方面是为社会开发提供底本，如《浙江文丛》、《台州丛书》、《金华丛书》、《绍兴丛书》等。另外，数字化工作每年也都给予了重视和经费支持，1万幅舆图已经完成，家谱数字化已完成2期，目前正在做第三期，雕版、拓片数字化也正在进行。

苏州图书馆
积极对馆藏古籍进行数字化

苏州图书馆（以下简称“苏图”）的古籍大体源于四个方面：一是苏图成立时正谊书院及学古堂的藏书；二是通过各种方式采购入藏；三是社会各界的捐赠；四是“文革”时期的抄家书。关于吸纳和接收私家古籍方面，苏图一直都有接受社会捐赠古籍，同时也采取复制的方式从民间获取珍贵家谱文献的复印本，填补馆藏空白。

苏图建有专门的古籍楼收藏古籍，古籍书库的各项条件都符合文化部2006年8月发布的《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古籍收藏条件良好。而苏图在古籍上的难题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古籍的“藏”、“用”矛盾突出，尽管苏图一直以来都在积极从事古籍数字化及原版影印古籍的采购工作，该矛盾有所缓解，但短期内难以全面解决；二是古籍从业人员相对比较年轻，古籍修复等相关工作经验积累不够，需要积极参加业内组织的相关培训，在工作中进一步提高。

苏图在苏州市财政的大力支持下，每年都有专项经费投入古籍保护及古籍数字化等工作中。近年来，苏图结合古籍保护工作，还积极对馆藏古籍进行数字化，包括建立了《苏州地方文献数据库》，以及馆藏国家珍贵古籍的数字化工作。至今已经完成数字化古籍335部5429卷304612页。可以全文检索，大大便利了读者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困扰古籍保护工作中的“藏”、“用”矛盾。

●资讯

中法哲学家共话“何为启蒙”

商报讯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办的“何为启蒙”文化沙龙在北京举办。中国青年学者、**《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作者周濂和法国国际哲学公学院哲学家瑟鲁阿·陆斯特·布尔比那出现活动并与读者交流。

“启蒙通常与欧洲和法国联系在一起，它仿佛与世界其它地方割离开来。”这只是布尔比那论述法国启蒙运动的一个观点。两位学者的对话活动把殖民问题置身于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来探讨：何为启蒙？同时还从欧洲以外的角度以及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探讨更为深远、更为广义的“启蒙”问题。

（澹 泞）